

## 第二章 冷戰時期中共與美日安保

中共於 1949 年建立政權之初，中共領導人環顧當時的內部情勢以及國際局勢，從自身國家安全以及政治需要的角度出發，因而在對外戰略上選擇向蘇聯「一邊倒」，藉此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然而，1956 年蘇共 20 大的召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發生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中蘇關係也因此而惡化。1960 年蘇聯更撤除對中共的援助，中共外交戰略於是乎逐漸脫離對蘇「一邊倒」進而轉向「反美帝、反蘇修」的戰略，1965 年起中共外交更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提出世界革命戰略，使得中共在國際上一度陷入孤立狀態。1969 年起又將外交戰略調整為「一條線、一大片」的聯美制蘇反霸統一戰線，視蘇聯為主要敵人並集中力量予以對付。此時又逢中美關係緩和及與日本關係正常化兩項重要契機，中共更在毛後時期經鄧小平主導，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自此中共外交戰略逐漸擺脫意識形態窠臼，集中力量於國內經濟建設上來，並致力於尋求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以加速現代化的建設進而實現其國家目標。本章將循上述外交戰略的演變歷程，從中共對蘇聯、美國及日本的雙邊關係出發，藉以解釋中共在各個階段中對美日安保同盟體制態度及認知上的轉變。

### 第一節 冷戰時期中共「美日安保」觀之形成背景

冷戰時期的國際格局基本上呈現兩極的態勢，分別是以美國及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延續二戰以來的發展，因此在東北亞形成了美日安保同盟及中蘇友好互助同盟的兩面對峙局面。本節將分別以 1950、1960 年代為背景，分析此時期中共的對外雙邊關係，為其後將要處理的中共「美日安保」觀，先行做一歷史背景說明。

## 一、1950年代「聯蘇反美」階段

「聯蘇反美」階段所呈現的是一種以意識形態為主要因素並混合種種利益考量下的戰略選擇，然而此一戰略是卻以意識形態開始，也因意識形態而告終。

### (一) 中蘇同盟與中美對立

「聯蘇反美」階段是從 1949 年底毛澤東宣布向蘇聯「一邊倒」始，至 1960 年 6 月蘇聯驟然對中共全面撤銷援助為止。1949 年 12 月，毛澤東以慶祝史達林 70 歲生日之名訪問莫斯科，並簽署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可將此視為中共在政權成立之初，基於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產生的「聯盟」取向的外交。而中蘇共原始的假想敵原是日本，但在韓戰爆發後，美國取代日本成為中蘇共共同的敵人。<sup>1</sup> 中共建立政權後，雖然美國一度以美援為誘因企圖與中共建立關係，但中共方面仍堅持其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的一貫反美政策。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聯合國決議協助南韓制止北韓侵略，基於軍事上的理由，美國政府一方面派兵援助南韓，一方面則下令中立化臺灣海峽，以防止戰事的擴大。中共除了認為美國此項舉動是「武裝侵略台灣」外，更派員至聯合國控訴美國，同時在國內展開反美的活動。1950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軍方傳達新的方針，一方面譴責美國侵略台灣干涉中國內政，另一方面將解放台灣的時間向後推延。中共外長周恩來亦發表政府聲明，指出：不管美國帝國主義採取任何阻撓行動，臺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這不僅是歷史的事實，且已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後的現狀所肯定。1950 年 11 月中共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談話，控訴美國武裝侵略台灣，指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駁斥美國關於「台灣地位未定」的論調。12 月還於聯合國所在地舉行記者會，繼續控訴美國與台灣國民政府，譴責美國積極武裝日本並質疑美國

---

<sup>1</sup> 吳安家主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 92 年），頁 204-205。

單獨對日媾和是企圖獨佔日本，進而將日本變為侵略中國的軍事基地。<sup>2</sup> 1954年9月3日中共砲轟金門並宣稱以武力解放台灣，企圖以此壓迫美國退出台灣海峽，但美國仍於同年12月2日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中共對台武力恫嚇不成，其後便改採和平攻勢，同時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國，於1954年日內瓦會議及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後，宣示其「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精神，藉此倡導在亞太地區簽訂一個包括美國在內的「集體和平公約」，並表示願和美國坐下來談判，藉以緩和遠東情勢。

此時美國在姑息主義以及輿論的壓力下，採取一方面不附和中共簽訂所謂「集體和平公約」，但另一方面接受與中共展開談判。1960年9月人民日報曾就美中會談100次提出社論，除了重談美國霸佔台灣的論調外，並宣稱中美會談之所以進行，是由於「美國以武力侵占了中國領土台灣而造成兩國之間的國際爭端，這個爭端只能由美國同意放棄使用武力，同意自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他的一切武裝力量來解決。」<sup>3</sup>

## (二) 中蘇失和

1950年代中期，中蘇共雙方雖在表面上維持友好和平的關係，但在政策及利益上的差異，以及先前所遺留下的積怨，已然升高為對彼此不滿的情緒。1956年2月赫魯雪夫於蘇共第20屆黨大會中發表所謂「鞭史演說」，公開提出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存的路線，並高唱第三次世界大戰並非不可避免的論調。<sup>4</sup> 自此中蘇共在路線上出現歧異，特別是雙方在對美國的評價上產生了嚴重差異。而儘管中蘇共相互稱對方為「修正主義」及「教條主義」，但由於此一歧見在當時並未公開，因此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會議上所提出的「中共在國際事務中的方針」

---

<sup>2</sup> 宮力，**毛澤東與美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頁36-40。

<sup>3</sup> 關中，**美國與中共：充滿變數和矛盾的關係**（台北市：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民國81年），頁6-9。

<sup>4</sup> 蘇起，**中蘇共關係正常化之研究(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台北市：政訊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9年），頁23。

報告中，頭一條即為「繼續鞏固和加強同偉大的蘇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永恆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誼」。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也強調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並對蘇聯援助表示感謝。但自1956年蘇共第20屆黨大會後，中共即展開了批判所謂蘇聯修正主義的一連串行動，因此不到4年的時間，中蘇共的鬥爭就遠遠超出了理論的範圍，而擴及對整個世界局勢的判斷、關於反帝鬥爭戰略與策略部署、中蘇兩國兩黨的關係，以及中蘇共與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問題。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前往莫斯科參加世界共黨大會，公開表示反對「和平共存」政策，並要求把「反修正主義」和「暴力革命」列入大會宣言，進而與蘇共的「反教條主義」與「和平過渡」相抗衡，自此雙方矛盾逐漸檯面化。毛澤東出於意識形態以及憂心蘇聯與美國妥協會出賣中共，因此在大會後也決心在內政上擺脫蘇聯模式。<sup>5</sup>

1958年的中東危機，蘇共贊成與美英法等國召開高峰會議，卻因中共的抵制而作罷。中共一方面加強反美聲浪，另一方面又在8月發動「八二三炮戰」，再次強調以武力奪取台灣，並展開了以反美為中心的精神動員，發動以美國為假想敵的「全民皆兵」運動以及「三面紅旗」運動，中共舉行反美示威遊行並發表「毛澤東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一文，藉以發動人民在理論上的普遍學習。「八二三炮戰」中，蘇聯懷疑中共想拖其下水而遲遲不肯表態，造成中共在此戰役中的失敗，而上述中共在內政及外交上的舉措，在事後證明皆係其向蘇聯攤牌的動作。<sup>6</sup> 1959年9月赫魯雪夫訪美，以實際行動展現其「和平共存」的外交政策。10月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在中南海更是以中立的態度來看待中印的邊界衝突，並於1960年6月趁中共內部經濟因「大躍進」失敗面臨危機之際撤銷對中共的援助。自此「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名存實亡，而中蘇共之間也在此後的30年間未曾有最高領導人的高峰會議。

---

<sup>5</sup> 吳安家主編，**前揭書**，頁207-208。

<sup>6</sup> 關中，**前揭書**，頁10-11。

### (三) 中日關係「政經分離」

戰後初期，日本的外交政策乃依盟軍的政策，朝中立化的方向發展。而對日本戰後外交政策有極大影響的吉田茂首相，其自 1946 年至 1954 年底兩度出任首相，任期前後長達 7 年，其於任內所訂下的外交基本原則，自然成爲繼任者遵循的信條，由於吉田茂以「富國輕兵」爲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實行對美一邊倒，搭美國的順風車，並以求先發展經濟爲前提。因此在對外關係上常與美國同步。<sup>7</sup> 日本在吉田茂主政下，雖基於安全的考量選擇做美國忠實的盟友，但吉田茂個人對中共此政權卻抱持著與美國不同的看法，因而採取了政經分離的原則，即雖然在外交上日本與美國一致承認中華民國，但從「第一次吉田書簡」的內容中可知，對媾和之後的日本來說，其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實乃最重要的外交課題。<sup>8</sup> 雖然日本在外交上追隨美國的腳步，但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情勢下，常出現不同的情況。

相對於美國自 1950 年至 1972 年對中共實行長達 20 多年的禁運，日本則是與中共逐漸展開經貿往來，自 1951 年至 1954 年止，中共與日本就簽訂了兩次的貿易協議，而日本方面也由官方的外務省放寬禁令，制定「政經分離」的對中外交原則。通產省於 1953 年 1 月首度解除對中共的禁運，其後又於 7 月由國會通過了「日中貿易促進決議」。<sup>9</sup> 由此可見日本有別於美國，在經貿方面與中共維持著一定程度的良好互動關係。特別是日本鳩山內閣上台後，中共與日本民間交流活絡，1955 至 1956 的一年間，中日兩國民間或半官方的協定就多達十幾個。

在中共與美國關係在韓戰後持續僵持此一背景下，中共也根據毛、周的指示，開始形成了一個對日政策的總方針—發展中日兩國人民之間(不是政府間)的友好關係，孤立美國，間接地影響日本人民，給日本政府施以壓力，迫使日本改變對中國的關係，逐步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1954 年底吉田茂下台，日本改由

---

<sup>7</sup> 何思慎，「戰後日本對華政策之研究(一九四五—一九九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87 年 3 月)，頁 32。

<sup>8</sup> 何思慎，**前揭書**，頁 52-53。

<sup>9</sup> 何思慎，**前揭書**，頁 56。

鳩山一郎執政，鳩山表示要發展與中共的關係。中共見此形勢，便由中聯部部長王稼祥主持起草一份對日政策的綱領文件，經總理周恩來批示後交付政治局討論。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一份名為「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畫」的文件，此文件可說是中共第一個全面對日政策的重要文獻。

當中確定了一些對日政策的基本原則如下：

1. 主張美軍從日本撤退，反對美國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和復活軍國主義；
2. 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爭取改善中日關係，逐步達到外交關係的正常化；
3. 爭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對日本人民的處境表示同情；
4. 給日本政府以壓力，孤立美國，以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對中國的關係；
5. 間接地影響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日本獨立、和平、民主的運動。<sup>10</sup>

日本政府歷經鳩山一郎(1954年12月始)以及石橋湛山(1957年2月止)兩任內閣以來，與中共經貿關係互動良好，中共亦以上述對日政策方針的文件為基礎，廣泛地與日本民間產業各界展開友好的互動，更在鳩山內閣期間與日本展開了官方的正式關係。

#### (四) 中共與美日安保條約批判

美日安全條約於1951年9月8日，與「舊金山和約」同日簽訂。條約中給予美國無條件駐軍日本領土及其周圍的權利。名義上雖是雙邊性質，但實際上日本是犧牲其主權以換取美國對其安全的保障。吾人可藉由條文中之規定知其為一項不平等之條約。例如第一條「在合約和本條約生效之日，由日本授與美利堅合眾國接受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紮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駐日美軍得以「根據日本政府的明顯要求，為鎮壓由一個或幾個外國之煽動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

---

<sup>10</sup> 張香山，**中日關係管窺與見證**（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頁225-227。

大規模暴動和騷亂所給予的協助。」

針對美日安保同盟體制，中共基於反美帝的意識形態，同時出於其與美國在諸如 1.台灣問題；2.朝鮮半島問題；3.禁運問題；4.不承認問題；5.聯合國問題；6.戰爭威脅問題等等現實國家利益的考量，在視其主要敵人美國以及作為其屬國的日本為假想敵的情況下，美日安保同盟體制遂成為中共批判美帝及日本的一個催化劑。1951 年美日安保條約成立之際，中共方面即認為此一條約的目的是美帝試圖將日本重新武裝並納入其亞太圍堵戰略一環，並以中蘇共為假想敵的具體展現。中共評估此約不但造成重新武裝日本的後果，再者對中蘇以及亞洲國家造成安全上的威脅，更甚著是日本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皆成為美國的附庸。<sup>11</sup>

1955 年 2 月 26 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即談到：

我們一向主張一個獨立、和平、民主的日本，可以有自衛的武裝。但是有些日本人士卻企圖假借「自衛」之名，在目前大規模地重新武裝。以便復活日本軍國主義，這與我們的主張是毫無共通之點的。因為日本今天還處在美國的半佔領狀態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日本武裝力量，不能不成為美國的侵略工具。<sup>12</sup>

由此可知中共此時對日本批判的出發點，乃是基於對日本依附其主要敵人美帝的批判，以及對日本再軍備的憂慮。直至 1957 年 2 月起岸信介內閣上台，由於重拾與美接近的論調與中華民國友好，中共方面認知到岸信介內閣的對中敵視態度，因此對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批判才又重現於諸如人民日報等機關報的評論中。1958 年 7 月中共透過人民日報社論表示對日本岸信介政府的原則及態度，社論中指出，如果岸信介繼續敵視中國人民，繼續製造兩個中國，繼續阻撓中日兩國正常關係的恢復，那麼中日來往全面中斷的責任應該全部由岸信介政府負責。

---

<sup>11</sup> Jianwei Wang and Xinbo Wu, "Against Us or with U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f America's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Korea," in *America's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Korea in a Changing Northeast Asia Project Discussion Paper*,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1998), p.6.

<sup>12</sup> 社論，「日本人民面臨著兩條道路」，*人民日報*，1955 年 2 月 26 日，第 1 版。

<sup>13</sup> 1958年10月人民日報刊載的觀察家評論指出：

岸信介首先宣布，「取消(日本)憲法中關於禁止戰爭的條款的時機已經到來」。他主張日本能夠派遣軍隊到國外去，以便「在維護自由世界的戰鬥中起充分的作用」。接下去，岸信介就模仿杜勒斯的口吻說，「臺灣的局勢不是內戰，而是一場反對共產主義侵略的國際戰爭。」他公然污滅中國過去在朝鮮和越南是侵略者，「現在他們是侵略金門和馬祖的侵略者。」岸信介並大喊大叫地說，「對日本的安全來說，朝鮮和臺灣不落入共產黨人手中是絕對必要的。」這樣，岸信介就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計畫明明白白地搬出來了。那就是：第一步，修改憲法，第二步，跟著美國侵略中國和亞洲。<sup>14</sup>

在批判日本岸信介內閣親美台敵視中共的政策外，中共也延續了1955年所定之對日方針，持續爭取日本民間的支持進而對日本政府施壓，中共總理周恩來在1957年7月就曾向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提到，若中共與日本恢復正常關係以後就可以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表示只要日本取消日美安全條約和美國取消在日本的軍事基地，並且從日本撤出駐軍，使日本能夠獲得完全獨立，那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關於以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再起和被人利用為目的的條款是可以修改的。<sup>15</sup>但事實上日本政府是朝向與美國就修訂「安全條約」的方向發展，因此1958年11月中共外長陳毅即針對美日修改「安全條約」發表聲明指出：

日本岸信介政府也甘願投靠美國，把日本更緊地綁在美國的戰車上，以便實現他繼續敵視中國和向東南亞擴張的政策。……目前美國和岸信介準備對日美「安全條約」所做的修改，卻完全同日本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中國人民從來不反對獨立、和平、民主的日本擁有自衛的武裝，來保衛自己的獨立。……中

---

<sup>13</sup> 楊正光主編、張暄編著，**當代中日關係四十年(1949-1989)**(北京：時事出版社，1993年)，頁122。

<sup>14</sup> 觀察家評論，「日本軍國主義面目的大暴露」，**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7日，第4版。

<sup>15</sup> 「周恩來總理同日本記者談中日關係」(1957年7月25日)，**田中明彥研究室網站(東京大學)**，<<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



國人民一向支持日本人民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鬥爭，並且衷心地期望日本成為一個和平中立的國家……。<sup>16</sup>

周恩來其後於 1959 年對美日安保條約表示意見時曾提到，岸信介內閣修改美日安全條約將使美國繼續在日本保留侵略亞洲各國的軍事基地，因此修改美日安全條約不僅是日本國內的問題，也是國際問題。周恩來並向來訪的日本自民黨顧問松村謙三表示中共同情和支持日本人民的安保鬥爭，他提到：「因為中國人民擔心日本在美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可能會進一步陷入軍事同盟，並且將會進一步復活軍國主義。」<sup>17</sup> 在日本國內各界展開所謂「安保鬥爭」運動的背景下，中共上述官方談話及聲明除了隱含對日本人民統戰的意味外，還明白地表露中共擔心在美國的扶植下，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可能性。岸信介政府與美國正式修訂「安全條約」後，1960 年 1 月中共外交部旋即發表了關於美日簽訂軍事同盟的聲明：

中國人民一向關心日本人民爭取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鬥爭。自從岸信介登台以來，中國政府更不斷地指出日本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扶植下積極復活日本軍國主義和對外進行擴張的危險性。現在，中國政府不能不嚴正指出，這種危險已經成為現實的了。日美軍事同盟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標誌著日本已經公然參加美國的侵略性的軍事集團。這不能不引起亞洲各國人民的嚴重警惕。<sup>18</sup>

從上述一連串中共的態度與舉措可知，1950 年 2 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中共在建立政權之初，透過與蘇結盟以確保自身安全的一項戰略決定。由於中共採取向蘇一邊倒的結盟策略，加上韓戰中與美國的正面交鋒，因此中共一直將美國視為頭號的敵人。毛出於反美國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國家利益的角度，也就是美國可能對中共造成的直接威脅及對中國統一的阻礙等等認知中美關

---

<sup>16</sup> 楊正光主編、張暄編著，**前揭書**，頁 134-135。

<sup>17</sup> 羅平漢，**中國對日政策與中日邦交正常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 年），頁 107。

<sup>18</sup> 霞山會編，**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 1949-1997**（東京：財團法人霞山會，1998 年），頁 153-156。

係。毛澤東對此提到：我們主要的鬥爭對象是美國，英、法、義、西德要排到後面去。美帝國主義在我國周圍建立很多軍事基地來包圍我們。而毛也清楚地認知到光憑中共一己之力是無法與美國進行決定性的鬥爭，最主要的是要發動其他國家的力量一同行動。因此毛在此一時期的外交活動，貫穿的一條主線就是盡可能地團結國際上受到美國侵略壓迫的國家，組成所謂的「反美統一戰線」。<sup>19</sup> 而這個「反美統一戰線」目標的執行，可以從上述中共的對日政策方針中見其端倪。自 1957 年岸信介內閣上台，採取親美親台以及敵視中共的政策，致使中共除了持續地批判「美帝」外，對岸內閣的「軍國主義復活」也展開強烈批判，並對日本人民的安保鬥爭行動採取同情態度。

## 二、1960 年代「反美反蘇」階段

在 1950 年代末期，國內進行大躍進運動的背景下，中共採取同時與美國及蘇聯兩大超級強權對抗的政策，反美反蘇「兩條線」戰略階段約自 1960 年 6 月蘇聯對中共撤援，至 1969 年中蘇共發生珍寶島邊界衝突為止。此一時期中共在外交上的表現除受到國內政治運動極大的影響而具有濃厚的「左傾」傾向外，針對 1969 年「尼克森—佐藤聯合聲明」中的「台灣條款」更是大家撻伐，在戰略上遂與美日安保同盟體制成一對峙之勢。

### (一)「反美反蘇」兩條線

在「反美反蘇」兩條線的時期，中共對蘇關係持續惡化，與蘇聯儘管保持著形式上的聯盟，但實際上卻逐漸從盟友關係轉變為敵對關係。而中共則與美國持續處於敵對的狀態，因美國直接捲入越戰致使中美雙方的緊張關係升高至間接地軍事對抗中。在中蘇分立、中美對抗的背景下，意味著中共實行「一邊倒」戰略的國際條件以不復存在。由於陷入孤立狀態中，1960 年底、1961 年初在毛澤東

---

<sup>19</sup>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交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85-186。

提示了中共的對外戰略逐漸從「一邊倒」轉向「反帝、反修」的「兩條線」戰略。<sup>20</sup>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展開，中共將自視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展開所謂「造反外交」。在文革運動發展至最頂端的時期，中共甚至幾乎召回所有的駐外大使，不惜犧牲外交利益來滿足國內的政治鬥爭需求，中共此時的外交處境也當然限於孤立狀態。而中共對於美日安保體制的態度，也伴隨著中共國內激進政策所引發效應而趨向強烈批判的態度。

## (二) 對美日安保體制批判的升溫

1969年11月當「尼克森－佐藤聯合聲明」發表，決定美日安保條約自動延續並且美國同意於1972年歸還沖繩。美日安保條約與兩岸關係亦在1970年代的沖繩歸還聲明中被連結起來。此一條約的內容雖然沒有直接提到和台灣的防衛關係，但是都有相關的政府文件把台灣安全與安保條約連結起來。1969年11月沖繩歸還日本美日聯合聲明的第四項，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台灣、朝鮮條款」，並根據該聲明指出，日本的安全及韓國、台灣的安全，以及其他美國有義務協助安全防衛的地區，日本基於自身與其他地區全體安全息息相關的現實考慮，將確認美軍使用基地以及設施的權力。這項被稱為沖繩歸還日本所付出的代價條款，事實上標明了將日本的安全保障與台灣、韓國的安全保障相結合，都是美日安保條約所要保障的。

在此前後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以及「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即逐漸升溫，1970年6月23日人民日報即對美日安保條約的延長做此評論表示：「自動延長後的美日安保條約，實際上更加擴大其侵略範圍，並且升級為美日軍事同盟，相較於延長前的舊約更具侵略性，給亞太地區各國人民的和平與安全帶來更大的危險」。<sup>21</sup>

<sup>20</sup> 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在《中國外交新論》，劉山、薛君度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頁7-10。

<sup>21</sup> 霞山會編，「『侵略的な米日軍事同盟を断固粉碎しよう』と題する人民日報社説」，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1949-1997（東京：財團法人霞山會，1998年），頁343-345。「堅決粉碎侵略性的美日同盟」，人民日報，1970年6月23日。

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報對於沖繩歸還的問題則談到：「該協議的成立，使美日反動派在軍事上勾結更加強化，美帝國主義將日本更緊密地網綁在其戰車上，驅始著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為其推進在亞洲的侵略及戰爭政策作出積極貢獻」。<sup>22</sup> 而中共強烈批判的背後乃出自於將日本視為美國尼克森「新亞洲政策」的代理人、代美國成為「亞洲的憲兵」，因此竭力斥責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因而在此期間日本成為了中共「三反」（反蘇修、反美帝、反對一切反動派）的主要對象之一。

---

<sup>22</sup> 霞山會編，「『汚い取引、恥しらずなペテン』と題する人民日報評論員論評」，**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 1949-1997**（東京：財團法人霞山會，1998年），頁 370-373。「骯髒的交易，無恥的騙局」，人民日報，1971年6月20日。

## 第二節 「1972 年架構」與中共「美日安保」觀之確立

自 1969 年起中共高層做出了美帝、蘇修不可能單獨或聯合對中發動戰爭的國際情勢判斷，並將蘇聯視為主要敵人，完成「一條線」聯美制蘇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中美、中日關係的趨緩及建交，使得中美日三方在對蘇戰略上達成合作，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認知亦逐漸形成，不但先前批判的態度轉為軟化並且還加以認可。再者，一個維繫台海局勢穩定和平的「1972 年架構」也於此時漸趨成型，「台灣問題」此一因素遂在中共對美、對日關係中浮上檯面，當然也影響到了中共「美日安保」觀的發展。本節將試圖透過分析中共對外關係及政策的轉變，歸納整理出一個中共理解認知「美日安保同盟體制」的概念框架，並期望以此概念框架能繼續解釋其後中共因應環境轉變而產生的認知變化。

### 一、中美和解與中日建交

國際情勢至此出現了微妙的轉變，然而中共也趁此時勢做出因應，與美國展開和解並與日本展開建交談判，透過與美國結成準同盟關係以及與日交好以形成對蘇包圍之勢。

#### (一) 「一條線」戰略與中美關係緩和

早在尼克森的身分還是總統候選人時，就已經透露了將來中美和解之路的訊息，1967 年尼克森在「外交事務」季刊發表「冷戰後的亞洲」，當中提到「從長遠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 10 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sup>23</sup> 而這樣微妙的信號，中共領導高層當然會注意到並會有所反應。

---

<sup>23</sup> 呂乃澄、周衛平主編，**大棋局—中日美關係風雲五十年**（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頁 127。

1969年春，在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等四位老師參加「研究國際形勢」的任務，並於同年7月提出一份名為「對戰爭形式的初步估計」的報告。報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指出：「再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報告判定：「蘇修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他對我國的安全威脅比美帝大」。<sup>24</sup> 此份報告中對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的戰略分析，對打開中美關係提供了依據。陳毅還具體提出，「尼克森出於對『蘇修』的戰略考量，急於拉攏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這就必須採取向應的策略。」<sup>25</sup> 其後毛澤東就決定在中美蘇三角關係中「打美國牌」，並在蘇聯的擴張威脅下，建立一個從中國經中東到西歐，越過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國，再經過太平洋至日本，並且包括太平洋南岸的澳洲、紐西蘭在內的「反霸統一戰線」。與此同時再將這條線周圍的一大片亞非拉國家團結起來，形成「一條線、一大片」的格局。<sup>26</sup>

中共高層基於上述對國際情勢的判斷，在對美關係上做出調整，以蘇聯為主要敵人的「一條線」戰略因此底定。1971年7月，季辛吉完成了對北京的首次密訪。同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中共取得了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合法席位與常任理事國地位。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簽訂了「上海公報」，文件中即包含了「反對霸權主義」的內容，體現了毛建立「一條線」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之戰略思想。

## (二) 中日關係正常化

關於恢復邦交，中日兩國各有其需要及考量。首先，日本見蘇聯軍事力量迅速擴張，且北方四島問題的爭端持續存在，因而將蘇聯視為主要威脅，與中共建

---

<sup>24</sup> 蘇格，「中國對美政策的緣起與發展」，在《中國外交新論》，劉山、薛君度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259。

<sup>25</sup> 呂乃澄、周衛平主編，《前揭書》，頁128。

<sup>26</sup> 蘇格，前揭文，頁260。

交的利益非僅止於經濟，「聯中制蘇」的安全效益也是重點之一；再者，中共於 1971 年 10 月在聯合國取得代表中國的合法席位以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因而不得不正視中共國際地位提高的現實；加上 1972 年尼克森訪中以及「上海公報」的發表，美國的「越頂外交」在日本引起了極大震撼，與中共開展關係正常化已不能不被考慮。自 1965 年起日本對美貿易出現了首次順差，越戰中日本未依美國的期望提供援助，眾多因素下造成美日貿易發生摩擦，因此爭取中國龐大的市場，對日本有利。<sup>27</sup> 而中共首先則考量到在三面受敵的情況下，蘇聯被認定為主要威脅，與日本建交可牽制蘇聯；其次，與日建交可對美日關係產生一定的制約效果；透過談判與日本達成在臺灣問題上的解決，利於其統一目標；最後則是改善對日關係，可穩定其週邊及東北亞局勢。<sup>28</sup> 而這樣的出發點也對中共對美日安保同盟的態度上產生了影響。

1972 年起，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論調起了決定性的改變，轉換的核心在於 1971 年 7 月季辛吉密訪中國，以及隔年尼克森訪中兩大關鍵上。而日本由於受到美中和解的刺激，對中採邦交正常化的勢力在國內急速竄起。但其中日方最大的疑慮在於，中共是否會以解除美日安保條約作為邦交正常化的條件？但實際情情恰恰相反，中共在談判過程中，並沒有針對美日安保安保的廢除拿上談判桌上討論，反倒是採取正視條約存在事實的姿態。1972 年 6 月 14 日，周恩來對來訪的日本「日中友好舊軍人會」代表團表示，日本要成為獨立國家，當然應該保有自衛武力，對此中共不會加以干涉。<sup>29</sup> 原因出於中共看準日本與蘇聯因「北方問題」對立，因此一反過去大肆抨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立場，甚至對日本表示默認和支持「美日安保條約」的存在。

1972 年 7 月周恩來對來訪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初次表達無須廢除美日安保的態度。實質上確立了中共對美日安保承認及支持的立場。在竹入訪中之

---

<sup>27</sup>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三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年)，頁 134。

<sup>28</sup> 同前註，頁 134。

<sup>29</sup> 趙倩，**中共、日本關係之研究(一九七九~一九八五)**(台北：作者自印，民國 75 年)。

前，周恩來表示為照顧日本政府的困難，在「聯合聲明」中將不涉及「美日安全條約」以及 1969 年的「佐藤－尼克森聲明」。但田中訪中後，對中共關於此一問題的態度仍未感到確定，因此在與周恩來的第一次會談中，大平正芳就談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與第三國的關係，也就是指與美國的關係。大平提及由於美日在政治及經濟上關係緊密，美日關係對日本來說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因此美日關係是相當重要的。即使日本國內仍有對美國批判的聲音，但再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時，日方的立場是不改變與美國的現有關係。

周恩來針對大平所提的與美國間的關係，表示中共方面將不觸及此一問題的立場，並表示尊重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周恩來說到：「比如我們對日美安全條約有意見，當我們在聯合聲明中不提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你們的事。」又在第二次首腦會談中，周恩來又說到：「對於日美安全條約，客觀情況已經發生變化，尼克森與佐藤聯合公報中的臺灣條款部分已不適用了。尼克森與佐藤的聯合公報是前一屆內閣搞的，同你們無關。我們不想讓這個問題使你們為難，所以我們這次不觸動日美安全條約，儘管日美安全條約我們並不滿意。因此，不接觸日美安全條約，並不是說我們對他沒有意見。確定中日復交不使美國為難，也不是針對美國的。」<sup>30</sup> 在談判過程當中，中共還表示贊成日本人民擁有自衛的武裝力量，雖然因過去的歷史經驗而擔憂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但相信透過兩國來往能夠增進了解化解不必要的誤會。

從上述中共方面的態度可以得知，在 1972 年中日兩國關係恢復正常化前夕，中共儘管對美日安全條約本身仍有不滿，但為了中日復交的大局接受日本方面的建議，因而選擇不去觸碰美日安全條約，在雙方的聯合聲明中採取不評價此約的態度，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中之時，中共媒體對先前所提「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之論述以及對美日安保同盟的批判也幾乎不再被提起。雖然沒有對美日安保條約表示贊成及支持的公開聲明，但在例如周恩來與外賓私人會面的談話中，中

---

<sup>30</sup> 羅平漢，**前揭書**，頁 246-247。



共官方採取尊重美日兩國人民決定自身安全事務的立場，事實上已對美日安全條約採取認可的態度。<sup>31</sup>

1973年4月在尼克森「越戰越南化」政策的影響下，同中共及南、北越簽訂「巴黎和平協定」，美國逐漸自越南撤軍，中共認知到美日對其安全的威脅進一步減低，而中共的媒體也同時充斥著關於蘇聯進行擴張以及美蘇爭霸的言論。<sup>32</sup>

1973年1月，周恩來對自民黨議員木村武雄談到：「對日本而言，美國核子傘的保護，是對付蘇聯的必要措施。……將來日本完全獨立之後，當然就無需安保條約了。」<sup>33</sup> 1973年10月，中共外長姬鵬飛提到：「若從日本面對蘇聯的威脅而自衛的角度來理解，我們是支持安保條約維持的，我們雖然期盼日本擁有獨立的自衛能力，但目前日本被置於美國的核保護傘下是個不爭的事實，在此背景下若想要馬上放棄美日安保是不符現實的。日本對美國必須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依賴。」由此可知中共雖在與美日關係和解的背景，對於美日安保體制的存在有了明確的正面評價與認可態度，這相當程度地反映在美日安保對日本的「瓶蓋效用」上。

### (三) 「一九七二年架構」的形成

1972年2月的中美「上海公報」中，中共方面主張「台灣問題是妨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台灣的解放，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並無干涉的權利」；並對美國要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台灣撤除一切武裝力量與軍事設施」。但美國表示，美國認知(acknowledge)到「台灣海峽雙方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未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的立場。美國並表示「美國政府重申，美國政府關

---

<sup>31</sup> Allen S. Whiting, "Japan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ed. Michel Oksenberg and Robert Oxna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26.

<sup>32</sup> Jianwei Wang and Xinbo Wu, "Against Us or with U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f America's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Korea," in *America's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Korea in a Changing Northeast Asia Project Discussion Paper*,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1998), p.16.

<sup>33</sup> 霞山會編，「木村武雄議員に対する周恩来総理の日米安保条約等についての談話に関する邦字紙記事」，*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 1949-1997* (東京：財團法人霞山會，1998年)，頁455-456。讀賣新聞，1973年1月18日。

心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明確表明反對中共以武力解放台灣的立場，於是，「台灣問題」的解決乃延緩到美中兩國關係正常化才得處理。<sup>34</sup> 其後日本政府在 1972 年 9 月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共同聲明中，雖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問題，在共同聲明中第三項中表示「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此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張，並未予「承認」。同時，兩國在共同聲明第六項中表示「在相互關係中，以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日本的平松茂雄教授認為，根據這一條，日本政府是在表明反對中共對台使用武力的立場。<sup>35</sup>

尼克森訪中期間雖然也表示過美國希望和平解決台海問題的立場，但對北京而言要承諾「和平解決」確有困難。中共方面只能承諾將致力於和平解決，但一方面考慮到台灣當局的統一意願，再加上若放棄動武，即很可能會妨礙到北京的主權主張，這也可能成為促成台灣與大陸分離的誘因，這也就成為了中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考量，美國要中共承諾的「和平解決」訴求也因此無疾而終。<sup>36</sup> 直到美國卡特政府時期，兩國政府才達成協議，美方籲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而中方不對美方此一立場表示異議。<sup>37</sup>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國與中共建交，美國雖然與中華民國斷絕了邦交關係，但是美國並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美國政府在有關邦交正常化的共同聲明中表示「承認 (recognize)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另一方面卻表明了「認知 (acknowledge) 中國人的立場：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並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僅止於認知。美國此一立場基本上確認了上述 1972 年 2 月的「上海公報」所明載之美方立場「美國認知 (acknowledge) 到

---

<sup>34</sup> 平松茂雄，「台灣の安全保障をめぐる米中日関係」，〈<http://www.wufi.org.tw/jpn/hiramatu.htm>〉。

<sup>35</sup> 平松茂雄，前揭文。

<sup>36</sup> 邰培德(Patrick Tyler)著；聯合報編譯組譯，**中美交鋒**（台北市：聯經，2000 年），頁 163-164。

<sup>37</sup> 孟捷慕(James H. Mann)著；林添貴譯，**轉向**（台北：先覺，1999 年），頁 130。

台灣海峽雙方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sup>38</sup> 雖然美國未能以正式承諾的方式約束中共對台動武的可能，但美國之所以決心與中共建交的最大原因是，判斷中共在現在以及可預見的將來，並無能力及意圖對台灣行使武力。

當時美國的判斷是基於下列三項原因：

1. 中共與台灣的軍事能力；
2. 中共面臨的戰略環境；
3. 中共的現代化計畫。

關於上述第一項「中共與台灣的軍事能力」，美國判斷當時中共並無渡海攻台的軍事能力，另一方面則是台灣具備阻止中共侵攻的軍力。關於第二項「中共所面臨的戰略環境」，中共除了有意利用美日安保作為壓制蘇聯威脅的動機之外，只要與蘇聯在軍事上處於對立，中共就必須考慮此一「北方的威脅」，由於美國將中蘇軍事上對立之持續視為絕對必要的條件，因而美國判斷中共並無攻台的餘地。關於第三項「中共的現代化計畫」，美國判斷中共現代化計畫之成敗，端賴發展與美、日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間之經濟關係，如果對台動武，將使得與該國家關係惡化，導致現代化遭受挫折。<sup>39</sup> 因此自 1972 年起，一個中美台三方均不滿意但都暫時可以接受的維繫台海相對和平的架構出現，此一架構是以 1972 年 2 月和 1978 年 12 月中美兩國先後共同發表的「上海公報」和「中美建交公報」，以及 1979 年 4 月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為基礎。1978 年美台斷交之後，美國隨即制定「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安全做出某種形式的承諾。

而此一「一九七二年架構」的支柱有二：

1. 根據「上海公報」及「中美建交公報」，美國認識到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2. 根據「上海公報」，美國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

---

<sup>38</sup> 平松茂雄，前揭文。

<sup>39</sup> 平松茂雄，前揭文。

心，「台灣關係法」延續此一精神，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並嚴重關切威脅台灣安全及和平的任何強制手段。

而北京默認「一九七二年架構」的基礎即為美、台對「一個中國」的認同，若此一基礎遭到破壞，架構自然就不存在了。中共領導人對「一九七二年架構」的第二根支柱，也就是美國堅持兩岸和平解決政治紛爭的期望和對台灣安全的承諾，當然在感情上無法接受。因為這將給予美國一旦中共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時得以介入的理據和空間。

然而中共領導人還是默認此一架構的原因在於：

1. 美國已認同一個中國，並在「中美建交公報」中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兩岸的外交戰上北京認為已贏得最重要的勝利，並有信心在未來逐步迫使美國完全放棄對台的安全承諾；

2. 中華民國政府也認同一個中國，並在國際社會繼續堅持與北京「漢賊不兩立」的立場，紓緩了北京對台北尋求兩岸永久分裂的憂慮；

3. 在兩岸中國代表權之爭上，北京有信心完全壓服台灣。也就是說，北京認為時間對它有利，故此可讓台灣問題的解決再拖一些時日；

4. 中共需要美國抗衡蘇聯之心絕不亞於美國需要中共，中共願意為此妥協，暫時接納美國對兩岸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紛爭的堅持。<sup>40</sup>

基於此，一個維繫台海相對和平的「一九七二年架構」大致底定，並得以維持近二十年。

## 二、中共「美日安保」觀之形成

中美、中日關係和解所導致的聯合對抗蘇聯戰略，可以說是中共「美日安保」觀形成的一個最重要指標。然而中共向來對日本國內的保守勢力有所警惕，美國

---

<sup>40</sup> 王家英，「『一九七二年架構』的鬆動解體與北京的對策」，未來中國網站，  
<[http://www.future-china.org.tw/csipf/activity/19991106/mt9911\\_10.htm#1972](http://www.future-china.org.tw/csipf/activity/19991106/mt9911_10.htm#1972) 架構>。

便以此邏輯推出「瓶蓋效用」理論說服中共正面看待美國駐軍亞太。既然在戰略上已達成合作，美日同盟不再針對中共，又適逢中共經歷長期內耗欲休養生息，將其目標轉移至恢復國內經濟此一目標上來，基於上述原因，中共「美日安保」觀已然形成，由過去的批判抵制轉而認可此一同盟體制的存續，以下即是對中共「美日安保」觀三項認知形成的分析。

### (一) 第一項認知：利用美日安保作為對蘇聯戰略的資產

1968年蘇聯發表「布里茲涅夫主義」，表示為了社會主義世界全體的利益，得以限制一國的主權。8月捷克「布拉格之春」，蘇聯為首的華沙集團以軍事介入後，由於中共開始強烈感受到可能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因此對蘇「社會帝國主義」採強烈批判的姿態。<sup>41</sup> 1969年中蘇國境發生「珍寶島」局部軍事衝突事件。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不一致，最終升高爆發成軍事對立的狀態，致使1970年代中共決心聯合他國力量共同對抗蘇聯。

1970年代，中共將蘇聯明確視為主要敵人，與美國改善關係以牽制蘇聯。1969年3月至10月毛澤東與中共高層即依據國際形勢擬定中共對外政策的調整方針，得出了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對中戰爭可能性不大，以及蘇聯對中安全威脅較大並伺機接受與美國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等等結論。中共進行此一重要戰略調整的背景，正值美國欲脫離越南戰場以便對內消弭反戰情緒、對外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契機，中美雙方領導人均釋出善意，最後促成了1972年尼克森訪中並簽署「上海公報」。<sup>42</sup> 1972年尼克森訪中期間，尼克森即向中共總理周恩來堅決地表示，美國會針對蘇聯日益強大的軍事力量扮演平衡的角色。尼克森並向周恩來提到，中共不該覺得受到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威脅，因為美國在太平洋的駐軍目的是在維持和平與穩定。若美國從太平洋撤軍，蘇聯將會填補這個真空。<sup>43</sup>

<sup>41</sup> 蘇起，**前揭書**，頁35。

<sup>42</sup> 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在**中國外交新論**，劉山、薛君度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頁44-46。

<sup>43</sup> 邰培德(Patrick Tyler)著，**前揭書**，頁162。

美國意在暗示美國亞太駐軍符合中共國家利益，其中特別是針對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

在打「美國牌」以及「聯美制蘇」的背景下，中共根據毛在 1974 年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加強與第二、第三世界國家的反霸合作，受此影響中共在對日政策上也開始支持日本的對蘇事務，特別是日本與蘇聯在北方四島領土主權爭議上，這點從中共於大眾媒體上大力讚揚日本人民在北方四島問題上與蘇聯的鬥爭可看出端倪。<sup>44</sup> 由此可知，中共與美、日聯手圍堵蘇聯，認可美日安保，以收抗蘇抑日之效，何樂而不為。

## (二) 第二項認知：對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效用」說

在美方的遊說下對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效用，成為了美中兩國對美日安保體制存續的一致思路及觀點。1970 年尼克森與周恩來的會談當中，尼克森就以「美國在亞洲軍事的部署亦符合中共的利益」為說服的理由，提出抑制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理論。美國言下之意，就是向中共說明，美日同盟的存續(美國軍事力量的存在)，是避免日本在沒有防衛倚靠的情況下，自行強化武裝，進而採取干預(染指)台灣及朝鮮半島事務的手段，介入亞太事務。

由此觀之，尼克森與季辛吉在美中和解的背景下，對日本的角色有著兩種不同層次的認知，一是在大國力量競逐下作為一個潛在獨立因素的日本，另一則是作為美國亞洲盟友的日本。美國決策者以國家利益作為指導原則及對大國關係認知的角度出發，判斷日本單邊行動的可能性，當美國方面在不同場合中提到日本的核武化以及再軍備化，並以「瓶蓋效用」論為由說服中共時，即可說是在此種認知下的反應。但是日本學者添谷芳秀也指出，在概念上雖是如此，但尼克森與季辛吉在實際的外交行為上卻不相信日本是國際政治中的一個獨立行為者。季辛吉認為日本領導人缺乏或沒有能力進行戰略思考，因此在他們的眼中相較於中

---

<sup>44</sup> Jianwei Wang and Xinbo Wu, *op. cit.*, 17.

共，日本不值得美國將之視為一個在概念上以及戰略上的對手。<sup>45</sup> 因此美國在遊說中共高層認可美日安保同盟的過程中，事實上是以日本將來可能作為一個潛在的軍事核武大國，而美軍的存續是牽制日本此一的發展為由，以此為要點說服中共的。

1960 年中共領導層原本是支持中立日本並武裝化的，但周恩來在 1970 年 6 月對日本將來發展方向的發言，卻出現轉折。他提到日本若脫離美帝支配，擁有獨立的武裝，將會在亞洲與美國爭奪霸主地位。由周恩來對日本未來發展的認識中可窺出其對日本獨立於美國保護之外，將導致軍國主義化的擔憂。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高層對日認識的轉變，是基於以下背景：

1. 尼克森於 1969 年發表「關島宣言」，要求其盟國肩負更多的防衛責任，在此戰略變化的敏感時機，又正值 1970 年剛上任日本防衛廳長官的中曾根康弘策劃日本第四次防衛力整備計畫，並宣示「面對侵略，先傾全國之力擊退之」的自主防衛構想。儘管最後「中曾根構想」因日本國內輿論的反對而觸礁，但中共也將此動向以「軍國主義復活」為由大加撻伐。<sup>46</sup> 並持續留意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發展動向。

2. 其次是日本經濟力的擴大。日本在 1960 年代末期，已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共對日本經濟成長的評價，從人民日報中的「經濟侵略」的言談中可知一二。

3. 中共的對日政策，向來是在對「軍國主義復活」的警戒下，持續地對日本親美派批判、對反美派支援之條線上進行的，因而對 1960 年安保改定反對運

---

<sup>45</sup> Yoshihide Soeya, "U.S.-Japan-China Relations and the Opening to China: The 1970s," Working Paper no.5, Faculty of Law, Keio University, <<http://www.gwu.edu/~nsarchiv/japan/soeya.htm>>.

<sup>46</sup> 1970 年至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人民日報即以一連串的評論員文章或社論的形式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提出批判，請參見以下文章。「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鐵証－評佐藤政府所謂『防衛白皮書』」，**人民日報**，1970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打倒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25 週年」，1970 年 9 月 3 日。「野心畢露」，**人民日報**，1970 年 11 月 24 日。「一個危險的信號」，**人民日報**，1970 年 12 月 4 日。「不許日本軍國主義重走侵略老路」，**人民日報**，1971 年 9 月 18 日。「佐藤反動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人民日報**，1971 年 9 月 26 日。「佐藤的拙劣表演」，**人民日報**，1972 年 3 月 3 日。「猖狂的挑釁、險惡的用心」，**人民日報**，1972 年 6 月 25 日。

動(安保鬥爭)採同情姿態。在此運動中，日共曾發揮其強大力量，聯合社會黨、工會、學聯等左派力量組成「統一陣線」動員抗爭，且幾乎要推翻政府成立左翼政權，但因為左翼團體內部發生分裂使得力量銳減，其後日共在國會的力量也大不如前，中日共的關係亦漸行漸遠。加上日本一般輿論及國民，對日本政府大多採同情立場，左翼聯盟的行動並未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sup>47</sup> 也因此安保改定反對運動的失敗，使得中共對「反美派」日本人民對美日安保體制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牽制效用，出現相較於前更為謹慎且不過於樂觀的態度。

美國基於上述的背景，以美日安保體制的存續有「管束日本」的涵義且符合中共利益為由說服中共，而中共亦抱持著相同的認知，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基於對日本政情的觀察，加上中共的對日觀有其一定的調性，因此可以說中共認同美國的「瓶蓋效用」論，充其量只是更進一步的追認而已。在中共的認知變化上，並沒有在基本對日觀上造成變動，中共向來貫徹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化的立場並予以警惕，因而中共僅僅是對作為「瓶蓋」作用的美日安保體制的評價有所變化。這也是中共對美日安保的第二個理解—「作為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作用」成立的依據。

### (三) 第三項認知：中共安全總體考量下的政策優先順位

既然美日安保不是針對中共而來，於是中共轉向消極承認的立場，認為美日安保是美日雙方的事與中共無關，而周恩來亦發言表明此一立場。若將美日安保置於中共與美國和解以及與日本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下思考，既然以不針對自己，美日安保的重要性在通盤戰略的考量下自然較低。而上述第三項理解是以下列兩項因素為背景：

1. 因為美中和解致使美日安保體制不以中共為標的，因而他的存在也未與中共的利益相違。中共在季辛吉密訪中國前，都未採取認可美日安保的態度，直

---

<sup>47</sup> 朱少先，「日匪關係的新趨向」，*問題與研究* 第 8 卷第 5 期(民國 58 年 2 月)，頁 308。丁宗裕，「美日關係之研究」，*問題與研究* 第 10 卷第 2 期(民國 59 年 11 月)，頁 128-129。



到尼克森季辛吉以前述理由說服中共後，中共在權衡得失後認為美日安保的存續並不損及自身利益，因而採取認可的態度。

2. 中共開始重視經濟建設的必要性。由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嚴重破壞，中共開始認為文革後政權的安定，是經濟建設是不可缺的重要環節。為此不但要持續一貫的自力更生政策，還要引入外國的經濟力及技術，提高工業技術水平已迫在眉睫。由於中共將美中和解以及中日關係正常化，視為在經濟建設上創造穩定外部環境的資產。因此美日安保條約在政策優先度的考量下當然相對較低。

### 第三節 1982 年「獨立自主外交」之形成與美日安保

自 1970 年代初期尼克森訪中與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至 1980 年代中期為止，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的批判以及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憂慮，幾乎未被提起。中共與美、日兩國關係也經歷了一段蜜月期。然而合作當中亦隱含著導致衝突的負面因素。中美之間的「台灣問題」以及中日間的「歷史問題」遂成為導火線，影響著雙方關係的發展，自然也就影響到中共對「美日安保」的態度。本節就嘗試以先前描繪的中共對美日安保三項認知來做分析，解釋其認知的轉變起因及過程。

#### 一、從對美日安保的認可到促進日本防衛力的強化

進入 1970 年代末期，蘇聯開始了全球性的擴張，中共高唱「反霸統一戰線」，美中相互加強了戰略上的合作。基於此，中共對日本的對蘇政策亦表支持，進而更進一步對日本防衛力量的強化採取較先前更為積極的認可態度。

##### (一)與美國構築反蘇聯霸權聯盟

若從第一項認知—中共對蘇觀來檢視，以反霸權主義原則為基礎的對蘇觀，在此時期仍然繼續。1975 年 1 月的人民代表大會公佈的新憲法即明文記載：

在國際事務中，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我們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援；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sup>48</sup>

---

<sup>48</sup> 請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5 年)」  
<<http://www.oci.org.cn/xianzhengxingdong/xiuxian/xiuxianlicheng/75xianfa.htm>>。

1975年1月，周恩來於中共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到：

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仍然是天下大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越來越激烈。……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壓迫者、剝削者和新的世界戰爭策源地。它們的激烈爭奪，總有一天要導致世界大戰。各國人民對此必須有所準備。

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根本分歧。由於雙方的共同努力，三年來兩國關係有所改進，兩國人民的往來有了發展。只要中美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能夠認真執行，兩國關係就可以繼續得到改善。

蘇聯領導採取了一系列惡化兩國關係的步驟，對我國進行顛覆，直至挑起邊界武裝衝突。他們背棄中蘇兩國總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經達成的諒解，拒絕簽訂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內容的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定，致使中蘇邊界談判至今沒有結果。

49

上述周恩來的報告，除了敘述中美兩國關係的改善外，並指責蘇聯惡化中蘇關係的種種行爲。表示美蘇兩大霸權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敵人，且明確指出蘇聯是世界戰爭最危險的根源。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等擊退「凡是派」重掌執政權力，鄧遂展開一系列的政策，先是與美國建交的同時擱置對台軍售問題，再者是利用中美建交所造成的「聯盟」幻象發動「懲越戰爭」，接著推動四個現代化，將注意力轉移至國內建設上，最後鄧也逐步地試探中蘇共正常化的可能。後毛時代即便在中共國內政治變動的背景下，其對蘇觀仍舊持續不變。如同鄧小平在1978年的發言中提到的「爲了反霸權並維持世界的和平、安全及繁榮，美國、歐洲、日本、中國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必須要共同抵抗戰爭的危險。不需要某種

---

<sup>49</sup> 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國革命歷史文獻資料，< <http://www.china-tide.org.tw/rev/rev.htm> >。

形式的協定或同盟，所需要的是對局勢的共同了解及共同努力。」<sup>50</sup> 加上中共強調中美日三國在對蘇政策上尋求政策上的合作，鄧小平指出中美日一定要發展更深一層的關係，若三方真心想要抑制北極熊的話，那麼唯一的現實策略就是團結合作。<sup>51</sup> 1979 年秋，中共即派出華國鋒及黃華等高層人士訪問東南亞、中東、非洲、歐美及紐澳等國，以推銷其「聯中制蘇」的「反霸」戰略。<sup>52</sup> 由此可知進入 1970 年代的後毛時期，中共在外交戰略上仍是以高唱「反蘇統一戰線」為主軸。

有鑑於此，在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鄧小平的對美戰略思考亦是建立在反蘇霸權主義的全球戰略基礎之上，而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使得此一戰略思考達到了極致。鄧小平也多次指出戰爭的主要危險來自於蘇聯，因此提出「第三和第二世界應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主義，這一反霸統一戰線，坦率地講也包括美國。所以我們說中美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對付蘇聯稱霸世界，美國理所當然是一個主要力量」。<sup>53</sup> 鄧還批評美國在這一方面做得不夠，1980 年他對來訪的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說，蘇聯的霸權主義是不會變化的，大家要聯合起來，認真對待蘇聯的全球擴張主義，因此我們可知「聯美反蘇」構成了此一時期鄧小平對美戰略思想的基調。從 1970 年代初的中美和解、中日邦交正常化至 1980 年初期的美中日三邊關係，由於其後 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定，使中日關係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再加上中美建交使美中日三方以「反霸權」為基調，深化了三國在合力對付蘇聯問題上的色彩。在「反霸權」的基調上，中共將美日安保體制視為其對蘇戰略上的資產。這是自 1972 年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從「認可」，進而轉變至「積極評價」的理由之一。

然而一開始美國所認知的雙方和解及其戰略價值，並非完全符合中共認知的「反蘇統一戰線」。若相較於中共自身將美中和解置於對蘇政策上的考量，尼克

---

<sup>50</sup> “Interview of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by U.S. commentators,” *Beijing Review*, 16 February 1978, p.18.

<sup>51</sup> Allen S. Whiting 著；岡部達味譯，*中國人の日本觀*（東京：岩波書店，1993 年），頁 186。

<sup>52</sup> 趙倩，*前揭書*，頁 206。

<sup>53</sup> 葉自成，*前揭書*，頁 198。

森及季辛吉在對中政策的意涵上，則是爲了確保其在美中蘇三邊關係中「主導發球」的地位，在對蘇關係上形成促使蘇聯合作的可能，此乃美國在美中蘇三角戰略上的本質意義。因此，美國眼中的美中和解，並不必然意味著美蘇對立的深化，而是同時以美蘇低盪爲手段的兩面並行手法，以聯中制蘇的手法取得在美中蘇三角關係中的主動地位。

美國對蘇政策的轉變起源於蘇聯自 1970 年代末期一連串的全球擴張行動，使得卡特政府初期由國務卿范錫主導的對蘇低盪政策受到極大的壓力而失敗，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爲首的對蘇強硬勢力遂取而代之。又由於對中政策的主導權掌握於布里辛斯基之手，使得布氏所提倡之對蘇強硬路線在對中政策中發酵。1980 年 1 月初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訪中，除了公開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外，還表示儘管沒有同此一地區其他國家採取共同行動對付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行動，但美國與中共除了在外交方面進行合作外，同時應在防衛領域進行合作，事實上就是針對著共同對抗蘇聯而來。<sup>54</sup> 美國卡特政府在布里辛斯基的主導下已決心與中共鞏固關係以作爲反蘇的夥伴，使得布朗訪中被授權的議題，從原本不得牽涉任何武器銷售及正式的軍事關係，轉變至將武器及可供軍用的尖端科技售予中共。<sup>55</sup>

1979 年 12 月蘇聯入侵阿富汗，使得中共陷入了尷尬的局面，儘管中共強烈譴責蘇聯武裝干涉阿富汗，但是中共方面也宣稱，中蘇兩方於 9 月開啓的副外長級談判不會因阿富汗危機而受到影響。但是 1980 年 1 月 19 日，中共外交部卻發表聲明：「蘇聯入侵阿富汗，威脅著世界和平與中國安全，這爲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又製造了新的障礙。在這樣的情況下，顯然不宜舉行中蘇談判。」有學者指出，中共對談判政策的改變是由於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於 1 月初訪中並且同意轉移高科技技術的結果。<sup>56</sup> 由於美國卡特政府改變了所有關於中共安全問題的立

---

<sup>54</sup> 平松茂雄，**中国の国防とソ連・米国**（東京：勁草書房，1985 年），頁 81-82。

<sup>55</sup> 孟捷慕(James H. Mann)著，**前揭書**，頁 159-160。

<sup>56</sup> 蘇起，**前揭書**，頁 48。

場，同時也放鬆了向中共出口各種尖端技術的限制，美國在對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上不再維持等距離的形象。因此，中共領導人更清楚地認識到中共對美國的政治和戰略價值。而中共方面，鄧小平對美國所提之美中抗蘇戰略合作也採取消極的回應，在與布朗的言談中即暗示阿富汗事件並非中共所在意之事，為與美合作抗蘇戰略預留了彈性的空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報一篇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反映了中共領導人不願在此時介入美蘇衝突的心態，文中表示中共應成為美蘇關係中的受益者，蘇聯擴張主義的矛頭首先是指向西方及日本，其次才是中共本身，且蘇聯沒有侵略中共的意圖及能力。<sup>57</sup> 上述一連串的動作透露出一個訊息，中共力圖避免因為與美國的戰略合作而導致與蘇聯關係的緊張，並努力保持自身在美蘇中戰略三角中靈活彈性的空間。

儘管如此，中共高層仍不敢對蘇聯掉以輕心，中蘇廣大陸地邊界的軍事緊張似乎未有緩解跡象。1981年9月鄧小平在校閱中蒙邊境軍事演習後表示：「國際上，反霸鬥爭更加發展，霸權主義更加孤立。但必須看到，超級大國的爭奪日益加劇，蘇聯霸權主義加速推進全球戰略部署，嚴重地威脅著世界的和平和我國的安全。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sup>58</sup> 自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開始，中蘇共雖然在政治上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和解，但是由鄧小平此番談話可以反映出在安全關係上中蘇共可說是沒有太大的緩和跡象，在邊界的武力對峙無論在質或量上都有提升，此般軍事安全上的緊張態勢直到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後才稍有緩解。<sup>59</sup>

即使邊界上仍維持軍事對峙，但鄧小平巧妙地運用了「美蘇對決」將蘇聯軍事威脅導向美國、西歐及日本，並同時繼續與蘇聯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以和戰兩手策略緩和與蘇聯緊張的態勢以保障安全。另一方面，又利用中蘇關係改善大打「蘇

---

<sup>57</sup> 平松茂雄，**前揭書**，頁 82-85。

<sup>58</sup> 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1981年9月19日)，**鄧小平文選**，  
<[www.easysea.com/jingji/dxp2/053.htm](http://www.easysea.com/jingji/dxp2/053.htm)>。

<sup>59</sup> 蘇起，**前揭書**，頁 73。

聯牌」，從美國、西歐及日本輸入現代化所需的經濟及技術援助。<sup>60</sup> 這點吾人可由 1980 年布朗訪中後決定轉移可供軍用的高科技技術一事上證實，中共如何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在其中獲利。

## (二)中共對日本防衛力的積極評價

由於第一項認知的深化及強化，使得以封鎖日本、瓶蓋效應為基本認識的第二項認知也產生了重要變化。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中共對日本防衛力產生積極的評價，並且更進一步展開支持日本防衛力增強的政策。1978 年 10 月 23 日中共副總理鄧小平訪日，日相福田赳夫表示，日本的「全方位外交」從實踐的經驗上看，並非是同任何國家都維持等距關係，日本在和平憲法的原則下自衛力量受到限制，也因此要堅持美日安保條約。對此鄧小平發言指出對包括美日安全條約和加強自衛力量在內的日本外交方針表示理解。<sup>61</sup> 而上述對蘇統一戰線也使日本在日蘇間的北方領土問題上獲得中共支持。1980 年 3 月日本眾議院通過了要求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以及促進解決日本北方領土問題的兩項決議。中共對此表示日本政府應要求蘇聯迅速撤走在日本北方領土上的軍事設施，並設法及早解決北方領土問題。<sup>62</sup>

中共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戰略研究所所長伍修權於 1980 年 4 月曾對訪中的日本前防衛廳長官中曾根議員提出：(1)希望日本加強軍備，建議日本將防衛預算自 1976 年始占總國民生產毛額(GNP)的 1%，提昇至 2%；(2)要求日本強化海空兩軍，否則不足以防禦蘇聯。<sup>63</sup> 1980 年 5 月中共總理華國鋒訪問日本時也提到，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應該有維持其防衛的權利以維護其獨立及主權，中共不會干預日本的內政，並同意日本防衛力的必要性，對美日安保也提表示支持日本與美國同盟關係強化上的努力。又華國鋒早前與前防衛廳長官中曾根康弘議員的

---

<sup>60</sup> 平松茂雄，前揭書，頁 86-87。

<sup>61</sup> 徐之先主編，中日關係三十年（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頁 132。

<sup>62</sup> 趙倩，前揭書，頁 165。

<sup>63</sup> 趙倩，前揭書，頁 207。

會談中亦表示在現有的環境下，中共歡迎日本防衛力量的強化。<sup>64</sup> 而這是中共領導高層首次公開對日本加強防衛力量表示肯定。

1983 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訪日時亦曾表示日本爲了自衛所需而保有防衛力量是理所當然之事。<sup>65</sup> 1984 年 7 月中共國防部長張愛萍訪日時對日本防衛廳長官栗原祐幸提到關於美日安保體制的問題，作出以下評價：「爲強化日本的防衛起見，美日安保條約是必要的。關於美日共同防衛問題，中共贊成此一政策。任何國家皆有其保衛自身安全的權利，因此有必要作強力的防衛力準備工作。」<sup>66</sup> 上述中共對日本防衛力強化的歡迎態度以及對美日安保體制的支持，其相關對外公開發言一直持續至 1984 年爲止。

中共對第二項認知「瓶蓋理論」的變化，相當程度上隨著上述第一項變化而調整。由於中共將日本防衛力量視爲對蘇戰略上的資產，因此對於日本防衛力量的增強出現了支持及歡迎的聲音。以此爲出發點可以得出以下幾項原因：

1. 在中美建交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的過程中，中共是出於將美日納入其對蘇聯「反霸統一戰線」中的出發點來考量的。1978 年日本園田外務大臣談到：「日本堅持美日安保條約並以美日友好關係爲外交基軸，在此基礎上不敵視任何國家，並超越體制差異的藩籬，以同所有國家維持發展友好關係爲外交方針。」鄧小平副總理對此作出以下回應：「中國充分認識到美日兩國的雙邊關係，也充分了解到美國贊成『反霸權』的立場。」<sup>67</sup> 由此可知中共的立場是基於與美國共組「反霸」路線，因而對美日安保體制採取積極的評價。爲了「聯日制蘇」，從過去強烈抨擊日本復活軍國主義，轉而堅決支持「美日安保條約」，並鼓勵日本加強軍備。藉此形勢對蘇造成外壓，以近似「和戰兩手」的外交手段「以戰逼和」，以求在邊境軍事緊張的緩解，其目的可見一斑。

---

<sup>64</sup> Jianwei Wang and Xinbo Wu, *op. cit.*, 20.

<sup>65</sup> 霞山會編，「中曾根總理と胡耀邦総書記の会談要旨を伝えた邦字紙記事」，**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 1949-1997**（東京：財團法人霞山會，1998 年），頁 643-645。**朝日新聞**，1983 年 11 月 25 日。

<sup>66</sup> 同前註，頁 144-145。

<sup>67</sup> 霞山會編，「園田外務大臣と鄧小平副總理と会見談話要旨を伝えた邦字紙記事」，**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 1949-1997**（東京：財團法人霞山會，1998 年），頁 510-513。**毎日新聞**，1978 年 8 月 10 日。



2. 由於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使中共對蘇聯更加強硬，並更加積極與美國的戰略合作腳步。1980 年美國國防部部長布朗訪中，在北京提倡中美戰略合作共同對抗蘇聯，並提出包含對中武器輸出在內的軍事合作提案，因而中共首次獲得大量足以加強軍事力量的美國武器。<sup>68</sup> 中共副總理黃華與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談話時表示蘇聯的行爲對世界和平及各國的安全產生直接威脅，並對國際社會產生挑戰。因此當務之急是抵抗蘇聯的軍事侵略及其擴張的野心，如先前中共總理華國峰提到的「在現有的環境下，中國對日本防衛力量的強化表示歡迎。」綜合上述的解釋可知在中美建交以及對付蘇聯的戰略合作此兩大背景下，中共將日本防衛力量視為對蘇的戰略資產，當然對其增強表示歡迎。

第二項認知對中共而言，其重要性當然不如第一項認知。但若從「第一項認知」的架構下來理解「第二項認知」的變化，就能夠有較為清楚的認識。因此，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第二個認知」從屬於「第一個認知」的構造，在此一時期得到了確立。

## 二、中美、中日兩組雙邊關係的摩擦與美日安保體制

1970 年代後半以及 1980 年代前半，可說是中共與美日安保體制的「蜜月期」。但雙方的蜜月期並沒有持續多久，原因出於中美、中日兩組雙邊關係正常化雖然帶來了良好氣氛，但其中也蘊含了嚴重的外交摩擦。究其因，乃出於中美間存在的「台灣問題」與中日間的「歷史問題」所引發的一連串效應。

### (一)中美關係的摩擦因素

中美關係中摩擦的焦點為「台灣問題」。中美和解後 1972 年的上海公報中，美國並未承諾從台灣完全撤退，而中共針對台灣問題的解決也從未放棄使用武力

---

<sup>68</sup> 同前註，頁 157-160。

的聲明。<sup>69</sup> 1978 年卡特政府與中共展開建交談判，中共向來堅持其建交三條件：斷絕與台灣政府的外交關係，中止與台灣的防禦條約，美軍人員及設施全數撤出台灣(即「斷交、廢約、撤軍」三條件)。而卡特政府希望得到中共不對台用武的承諾，並提出希望保留對台軍售的權利。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美方以片面聲明立場的方式，籲求和平解決台灣前途問題，中共則聲明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國的內政。關於最重要的軍售問題，美國可以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而中共未必明示同意，但只要不公然反駁美國此一立場，美國便可解釋為默示接受，這可說是中共最大的讓步。<sup>70</sup> 然中共仍在宣布建交後的聲明中強調：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這不符合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原則，不利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對亞太地區安全和穩定也會產生不利影響。<sup>71</sup>

1979 年中共與美國正式建交後，4 月美國國會隨即以國內法的形式通過「台灣關係法」，在第二條乙項中即載明「任何試圖以和平手段以外之方式，包括經濟抵制或禁運，決定台灣之未來，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為美國所嚴重關切」「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第三條甲項載明「為推行本法第二條所揭示之政策，美國將共應台灣必要數量之防禦軍資與服務，俾使台灣維持足夠之自衛能力」。而中共外交部方面發表聲明批判：「台灣關係法嚴重違反(1978 年)華府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聯合公報的原則。」<sup>72</sup> 中共與美國雖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但是在卡特政府任期的末兩年在對中及對台政策上卻出現了上述看似矛盾的趨勢。卡特政府一方面與中共擴大了包含政治、經濟及文化等領域的交往，但另一方面，卡特政府於暫停對台出售武器滿一年後，又重新擴大對台軍售。中美雙方在建交後因台灣問題導致緊張升高。而中美關係雖然因 1982 年中美「八一七

---

<sup>69</sup> 邰培德(Patrick Tyler)著，**前揭書**，頁 163-172。

<sup>70</sup> 關中，**前揭書**，頁 123。

<sup>71</sup> 陳鋒 林宏等著，**中美交鋒大紀實：1949-2001**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32。

<sup>72</sup> 杜南(Robert L. Downen)著；聯合報編譯中心譯，**破碎的中共牌：美國戰略中的現實或幻想** (台北：聯經，民國 73 年)，頁 65。

公報」中明載將逐年降低對台軍售，使得緊張關係暫時較為收斂，但中美雙方仍存有嫌隙。對中共來說，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可謂中美關係中的一顆不定時炸彈，「台灣問題」仍被視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負面因素。

## (二)中日關係中的摩擦因素

雷根政府時期美國大力重建軍力，不斷要求日本提高軍費，分擔防衛責任。1981年5月日本鈴木善幸首相訪美並與雷根總統發表聯合公報，同意再公報中首次使用美日「同盟」的字眼，並承諾增加國防力量，將海上防衛線擴張至距日本1000海浬之處。1982年就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不僅強調美日兩國為「命運共同體」關係，矢言日本是西方「不沉的航空母艦」，並打破三木武夫首相於1976年所設軍費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1%之上限，同意增加駐日美軍費用的分擔。<sup>73</sup>

中美間存在著諸如「台灣問題」等負面因素，而中日關係亦是如此，1982年「教科書問題」以及鈴木首相率閣僚參拜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除了中共外交部要求日方更正錯誤外，也使得中共也不再歡迎「日本防衛力量增強」。由於「教科書問題」及「參拜靖國神社」所引發的「軍國主義復活」警戒及批判，在雙方邦交正常化後的一段平靜後又出現了增強的態勢。<sup>74</sup>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期間內，中共近乎不反對日本加強防衛力量，美國同意向中共出售某些軍事裝備和技術，日本則加強分擔安全責任。中、美、日三國間雖然因意識形態以及國家利益等等差異所導致的衝突仍在，但是由於在共同對蘇戰略目標上的接近因而使衝突降為次要，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評價採積極正面的回應。<sup>75</sup>但經過了上述時期的轉折，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的積極支持論，以及對日本防衛力量增強的正面評價，至此已有了轉變的跡象。

<sup>73</sup>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 (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頁4。

<sup>74</sup> Jianwei Wang and Xinbo Wu, *op. cit.*, 24-25. 關於教科書問題，人民日報所作之批判如下，「忠言逆耳利於行」，*人民日報*，1982年7月30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日本政府應當切實糾正錯誤」，*人民日報*，1982年8月15日。8月29日紅旗雜誌亦發表評論員文章，「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危險」。

<sup>75</sup> 任曉、胡泳浩，*中美日三邊關係*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05。

### 三、「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與美日安保體制

隨著蘇聯釋出改善中蘇關係的善意，中共鑒於與美國無法達成真誠的合作夥伴，遂於十二大提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揭示其奉行不結盟的決心以及對美對蘇的等距外交。中蘇逐步邁向和解意味著中共「美日安保」觀的第一項認知的基礎受到侵蝕，日本在防衛政策及全球經濟上的成長，亦使中共再度對其產生警惕，「瓶蓋效用」的第二項認知趨弱。隨著「台灣問題」一再地被突顯，美日安保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受到中共注意，中共 1980 年代三大任務中的「統一」似乎因此將遭遇嚴峻挑戰，出於對將來發展所造成不利影響的預判，第三項認知於此時開始發酵。

#### (一) 中蘇關係舒緩的契機

第一點必須要指出的是，進入 1980 年代後中共對蘇聯的認識產生了變化。雖然中共對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一事，強烈批判蘇聯為「霸權主義」，使得中蘇外交次長級會議因而中斷。但中共並不因此希望中蘇之間的談判就此全面停止，而蘇聯方面亦做出善意的表示。學者蘇起即指出，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的契機，始於中共於 1979 年向蘇聯知會關於「中蘇有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續約問題，而中共的求和意願也可從其後的例證中得到證實，一般學者所提 1982 年蘇聯的「塔什干講話」僅僅是蘇聯其後較為明顯的求好動作而已。<sup>76</sup> 蘇聯入侵阿富汗使得美蘇關係陷入緊張，進而使蘇聯欲與中共改善關係。1981 年 9 月蘇聯建議恢復中蘇邊界談判，12 月又建議恢復科技交流。1982 年的頭 3 個月，因美國對台軍售問題而影響中美關係的同時，中蘇關係有了進一步改善的契機。1982 年 1 月中共代表團參赴莫斯科參加一貿易談判的預備會議，並且草簽了一項協定。3 月三位中國經濟學家為了研究蘇聯的經濟訪問莫斯科。<sup>77</sup>

<sup>76</sup> 蘇起，**前揭書**，頁 44-47。

<sup>77</sup> 兩國關係的穩定 (1981 年 2 月~1982 年 3 月)，**中蘇關係內幕紀實**，  
<<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history/wtgmwbtgbyi/zsgx/zsgx12.html>>。

1982年3月24日，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發表了重要談話。塔什干的講話中有幾項重點被視為對北京示好：一是蘇聯完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主權；二是不支持兩個中國的概念。<sup>78</sup> 而當中又反覆強調蘇聯政府主動提出了重新舉行中蘇邊界談判的建議。布里茲涅夫又強調蘇聯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並準備繼續同中共就「存在的邊界問題」、在邊境地區「實行加強雙方信任的可能性的措施」進行談判。<sup>79</sup> 由於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的發言較以往蘇聯領導人關於中共的談話有著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強調了欲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期望，因此中共外交部發言表示將會注意布里茲涅夫的演說。<sup>80</sup> 美國擔心北京與莫斯科逐漸交好會使其在戰略三角中的地位下降，因此在1981年10月間中共總理趙紫陽及外長黃華先後對美發出強烈警告後，便於1982年8月的「八一七公報」承諾將逐年減少對台軍售。從此事件正好可看出，美中台小三角在冷戰時期的互動，同時又受限於另一組大戰略三角。

## (二) 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明顯對外交政策作一重要宣示及改變，其中針對蘇聯方面，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提到「我們注意到蘇聯領導人一再表示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又說到「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辭而是行動。如果蘇聯當局確有誠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並採取實際步驟解除對我國安全的威脅，中蘇兩國關係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sup>81</sup> 中共又更進一步刪除了「現代修正主義」以及「美蘇超強的霸權主義」等字眼，採取了新的修正，改變其自1960年代末期以來將蘇聯斷定為「霸權主義」、視為主要敵人的對蘇態度。「第一項理解」中以「蘇聯為主要敵人」為基礎的「反霸統一戰線」，因為蘇聯「塔什干提案」

---

<sup>78</sup> 蘇起，**前揭書**，頁224。

<sup>79</sup> 蘇聯的友好表示(1981年9月~1982年3月)，同前註，  
<<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history/wtgmwbtgbyi/zsgx/zsgx13.html>>。

<sup>80</sup> 任曉、胡泳浩，**前揭書**，頁106。

<sup>81</sup> 請參見「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的報告」，<<http://njdj.longhoo.net/dj80/ca16687.htm>>。

所釋出的善意，使得中共在中蘇關係上不若先前般強硬。

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演說中揭示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可說是綜合中共對外環境認知所提出的外交政策路線。胡耀邦在報告中提到中共絕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絕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並高唱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論調。在胡耀邦的演說中，有著以下重要意涵，即避免將矛頭直指美蘇兩大超級強權，不樹立特定的敵人，所謂霸權主義行為也是針對個別的爭端，也就是所謂以中共自身的判斷採取彈性的立場。「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意味中共跳脫出先前以蘇聯為主要敵人此一思考，不但有將自身視為國際社會中的獨立行為個體的意義，且在對蘇談判上也有重開大門的意味存在。

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另一個特徵，則是中共希望與美國保持一定的距離。如前所述，1979 年到 1982 年間，中美關係因「台灣關係法」與對台軍售問題產生嚴重糾紛。由於中共對美國於建交後仍對台執意地給予承諾感到失望，因此認知到對美採取保持距離的必要性。鄧小平就曾提到，在和解跡象相繼出現的同時，諸多證據已經顯示，美國是一個政策經常隨著新任總統上台而變更的「不可靠夥伴」。<sup>82</sup> 總而言之，在「獨立自主外交」的基礎當中，除了在個別的問題上控制有損對外關係的態度之外，亦對外宣示不趨炎附勢、追隨強權勢力，中共與美保持距離的態度在在表示，美國也僅僅不過是中共應該對付的大國之一而已。

「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與過去相比，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它是「真正的不結盟」。他是相對於過去在 1950 年代與蘇聯結盟的「一邊倒」外交戰略，和 1970 年代初與美國實際上準結盟的「一條線」外交戰略而言的。鄧小平為此特別強調：「這些獨立自主外交戰略表明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sup>83</sup> 一方面，「獨立自主外交」的戰略目標是為其發展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具有使中共專心一致於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與美蘇維

---

<sup>82</sup> 邵培德(Patrick Tyler)著，**前揭書**，頁 405。

<sup>83</sup> 葉自成，**前揭書**，頁 165。

持等距外交的決定，也就意味著中共在美蘇中戰略三角中將積極爭取樞紐的角色。因為當時美蘇之間正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因而為中共在戰略三角中的角色提升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sup>84</sup> 而真正的不結盟在中共的評估考量下，對其外交政策的靈活度更有加分的效果。

曾對日本防衛力量的增強表示過支持態度的中共，在 1982 年中共的十二大政治報告中就指明日本某些勢力企圖恢復軍國主義。<sup>85</sup> 9 月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訪中，重點即在說明日本修改教科書以及恢復軍國主義等問題。然而 1983 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以及 1984 年國防部長張愛萍相繼發言表示日本擁有強大防衛力量是必要的，一般也被認為是基於對付蘇聯考量下所致。雖然中共在表面上不反對美日安保條約，但基本上卻開始警惕日本擴軍，特別是中日間「歷史問題」的發酵。基於上述現象，在中共所揭示的對蘇關係正常化三項原則（1.停止對越南的援助；2.從阿富汗撤退；3.從蒙古撤兵）尚未完全實現之前，中共仍會在對蘇交涉以及對美日兩國的合作上，採取靈活彈性的對策，以助於對蘇聯外交的有利面向的開展。

### （三）中共「美日安保」觀三項認知的變化

上述中共對蘇觀的變化，隨著對美、對日觀的變化，原本「第一項認知」中中共將美日安保體制視為對蘇戰略資產的看法，在中共採取「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同時趨於弱化。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的「第一項認知」出現更進一步的挑戰。自 1982 年塔什干宣言發表後，中共趁勢於其後對蘇聯展開一連串所謂「葬禮外交」，著手推動與蘇聯關係的改善。1985 年戈巴契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揭示新思考外交並於 1986 年發表「海參威演說」，對中蘇關係的正常化作出具體的讓步（宣布蘇聯自蒙古撤軍），此時中共認知到主要大國之間（美蘇、日蘇）的緊張將會趨於緩和，而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也將會因前述三項原則的逐一實現而深

---

<sup>84</sup> Allen S. Whiting, "Assertive Nation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sian Survey*, 23:8 (August 1983): 913-933.

<sup>85</sup> 請參見「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的報告」，<<http://njdj.longhoo.net/dj80/ca16687.htm>>。

化。至 1989 年中蘇終於實現了關係正常化的目標，對中共而言蘇聯造成的威脅已顯著地減少。從中蘇關係見到顯著改善的 1980 年代到達成關係正常化的 1989 年為止，隨著蘇聯在內政及外交發生重大改變以及國際格局變動下，中、美、日聯手抵制蘇聯此一戰略關係呈現弱化的趨勢，美日安保體制以及中日對蘇聯共同戰略的價值可說顯著地減少。<sup>86</sup> 中共方面也了解到其對美日安保體制的「第一項認知」自此也逐漸失去價值。

以所謂「瓶蓋效用」論封阻日本的「第二項認知」在此時期也產生了極大的動搖。日本的 1981 年海線 1000 海浬防衛、1985 年中期防衛整備計畫，以及 1986 年防衛費用突破 GNP 的 1%，從中共的角度看來，日本在美日安保體制的「責任分擔」下，其防衛能力與機能正日漸成長壯大。美日安保同盟是否對日本產生「瓶蓋效用」？令中共存疑，「瓶蓋效用」的認知因而下降。

就連「第三項認知」中，「美日安保在政策上的優先程度」也在此時開始有了變化。原因在於中共開始注意到台灣問題與美日安保體制之間的關聯性。又中共認知到在美日關係當中，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政治大國化以及經濟侵略的種種憂慮，皆在美日同盟關係下得到某種程度的發展。

綜上所述，自 1980 年代「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以來，中共與美日安保體制的關係，因為對美日安保同盟「第一項認知」的逐步瓦解、「第二項認知」效用的趨弱以及「第三項認知」的突顯，使得雙方的關係開始由「蜜月期」導向「潛在對立」的面向前進。

---

<sup>86</sup> 任曉、胡泳浩，**前揭書**，頁 106。